新文流

2007 年夏季刊

贸易的好处

保护主义的代价

《交流》是以文字和图片反映当前美国思想与生活中受到关注的问题的季刊。文中所表达的是作者的意见，并不一定反映美国政府的观点或政策。

编辑出版者：
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处
（中国 北京）

The new Jiao Liu is published in English as EJournals by the Bureau of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Programs (IPP) of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in Washington, D.C. For the English language link please go to http://usinfo.state.gov/pub/ejournalusa.html

刊头提字：胡雲復
审　　校：倪乐
制　　版：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制：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刊　　号：（ISSN 1052-55X）

新交流编辑部希望收到此刊物的读者能尽快将寄给您的回执填好并寄回本编辑部，这样能保证您及时收到下一期新交流。

问讯函件可直接寄往：
(1)北京光华路17号美国大使馆新闻文化处（邮编 100600）
(2)上海南京西路1376号上海商城东峰532室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新闻文化处（邮编 200040）
(3)广州花园酒店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新闻文化处（邮编 510064）
(4)沈阳和平区14纬路52号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新闻文化处（邮编 110003）
(5)成都人民南路4段，领事馆路4号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新闻文化处（邮编 610041）

编者的话

新交流

亲爱的读者：

美国驻华大使馆非常高兴地向您介绍新交流杂志。由于您一直是我们旧《交流》杂志的读者，所以我们还是一如既往地向您赠送新交流杂志。新交流包括美国著名专家关于广泛性和新闻性议题的评论和分析文章。在美中两国双边贸易不断增长的大背景下，我们选择贸易作为新交流的开篇主题。

您每季度都会收到一期新交流杂志，内容涵盖经济和贸易，美国社会和价值观，反恐及其他议题。我们希望这些内容能够为您带来丰富的资讯和娱乐，同时对您有所帮助。欢迎您将意见发送到 xinjiaoliu@yahoo.com

新交流中所发表的意见不一定反映美国政府的观点或政策。美国国务院和美国驻华大使馆对新交流及其所链接的其他网站的内容不负有责任；这些责任只由相关网址的出版人自行承担。除非在杂志中有特别的版权限制说明，使用该文章、图片和释义必须获得版权人的同意，否则，杂志中的文章、图片和释义可以在美国境外被复制和翻译。

衷心感谢！

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处

传真：(010) 65322951
电子邮件地址：xinjiaoliu@yahoo.com
我们所提供的电子邮件地址仅用于与本季刊有关的事宜。请不要邮寄广告或来函询问与本刊物无关的事项。

目 录

1 **导言**
美国副贸易代表约翰·K·斐农努大使

2 **为什么要贸易自由化？**
美国副助理贸易代表克里斯蒂娜·塞维拉
开放贸易刺激增长，帮助亿万人民脱离贫困。

6 **保护主义与政治**
《国家期刊》国际经济专栏作家布鲁斯·斯都克斯
在政治压力下，各政府抵制进口而保护本国生产者。
由于保护主义是政治问题，因此必须通过政治途径解决。

10 **发展中国家需要相互开放市场**
世界银行中国和蒙古处处长杜大伟
多边贸易谈判的好处一半来自发展中国家相互开放市场。

13 **消除工人对贸易的恐惧**
威廉玛丽学院经济学教授戴维·费尔德曼
因生产环境变化导致的失业大多源于技术进步，但常常被归咎于进口的增加。

16 **正确汲取保护主义的教训**
坡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盖瑞·豪夫鲍尔和研究助理康斯坦丁诺·皮切达
惨遭战争破坏的东亚各经济体曾一度以保护主义政策振兴经济，
但只是在开放进口后这些经济体才实现了持续的高增长。

19 **清楚明白的改革模式**
美国商务部中欧和东南欧司司长乔纳森·金博尔
许多前苏联东欧国家开放了市场，少数国家继续闭关自守，
二者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显著，发人深省。

21 **世界贸易组织如何反保护主义**
Hills & Company 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卡拉·希尔斯
世界贸易组织是抵御保护主义的最大堡垒。

24 **参考文献**

26 **相关网站**

导言

美国副贸易代表约翰·K·斐农努(John K. Veroneau)大使

约翰·K·斐农努大使

在展望国际贸易体制的未来时，历史与经验为我们提供重要的洞见。尤其二战结束以来，贸易一直是世界经济进步不可或缺的发动机。在关贸总协定（GATT）及其继承者世界贸易组织的推动下，一轮又一轮的多边贸易自由化的努力帮助欧洲重建被战争破坏的经济，为独立的、寻求现代化的亚非拉以及中东国家提供一条行之有效的发展途径，使数以亿计的人民脱离贫困。

过去七十年，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到乔治·W·布什的美国历任总统都坚定支持降低美国及其全球盟国之间的贸易壁垒。他们都坚信贸易发挥着核心作用，促进生活水平提高，增进繁荣，扩大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公民的选择。结果是，美国成为世界最开放的重要经济体，无庸置疑，这种开放性是其力量的来源。根据彼得森世界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观点，正因为1945年以来的贸易自由化，美国的年度总收入多出了一万多亿美元，即家庭年均收入多出了9000美元。

当前，我们正目睹一个全球市场突飞猛进的时期。仅自冷战结束以来的这些年，随着参与市场的政治壁垒与科技壁垒的不断消除，有大约二十亿工人与消费者新近加入到国际经济中来。为使更多个人有能力追求梦想、养育家庭，我们必须充分发挥贸易的潜力，促进全球经济进一步增长，为创造优质工作机会提供动力。

根据世界银行估计，全面消除贸易壁垒可使数以千万计的人民脱离贫困，故寻求贸易进一步发展的道德责任是明确无疑的。另外，虽然免除债务以及外援能够对贫困国家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但是贸易与贸易自由化可能是更有效的工具，可减少贫困，为社会提供经济资源以满足其最紧迫的需求。世界银行认为，发展中国家仅通过消除货物贸易壁垒就可以增加岁入1420亿美元，这还是保守的估算。这个数字超过了2005年度主要工业国所提供的800亿美元的对外经济援助以及它们建议为发展中国家减免425亿美元债务的总和。

毫无疑问，在制造业、服务业以及农业领域中，实施贸易自由化的潜在惠益十分可观。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搁浅让许多人感到失望，他们相信贸易有力量促进经济发展，扩大机会，促成各国之间的和平合作。因此，布什总统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要求其继续寻求一项符合多哈发展目标的宏大平衡的协议。

国际经济领域的迅猛变化及其对地区、当地以及个人造成正负两面的影响使一些人感到忧虑，这是可以理解的。每一个社会必须找到各自的办法，帮助那些因经济结构变化而丧失谋生手段的人解决问题，缓冲转型带来的冲击。但是，走回头路或树立贸易的高墙壁垒并非答案：贸易壁垒仅保护少数，却以牺牲多数为代价，长远而言，那些不能抵制保守主义行为的国家面临诸多风险，包括增长速度较慢，一些行业低效而无竞争力，失业增加以及通货膨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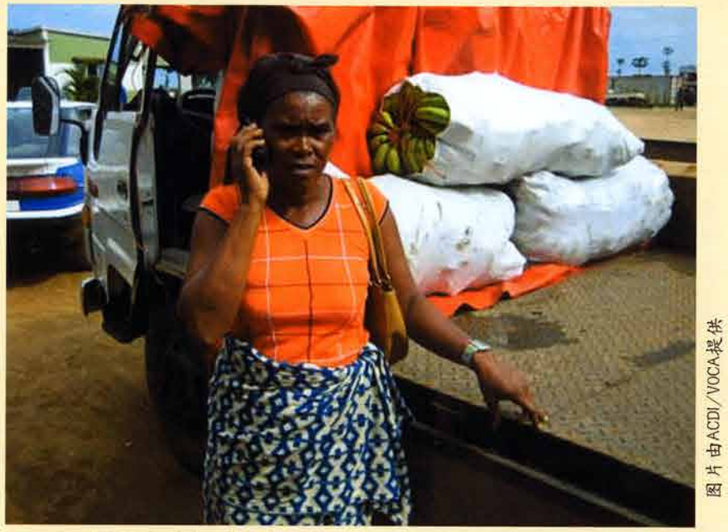
增加贸易具有广泛的社会效益：富裕起来的国家更有可能将资源投入环境保护，而出口行业的职工工资可能超过本国非出口行业的职工工资。今天，贸易所带来的好处对于数以亿计的个人而言是确凿无疑的，他们的生计与家庭都依赖贸易。

我们希望读者花时间浏览本期的每一篇文章，深刻理解贸易自由化在改善世界各国人民生活质量方面的效能。

美国副贸易代表
约翰·K·斐农努大使

为什么要贸易自由化?

克里斯蒂娜·塞维拉（Christina Sevilla）



图片由ACDI/VOCA提供

增加货物贸易的自由度具有全球效益，大约一半惠益由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分享，如这位安哥拉的水果商。

事实证明，开放贸易能够为社会创造财富，满足社会需求，促进经济发展，而总体而言设立贸易壁垒则使人民与国家每况愈下。美国在1930年代实施破坏性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s）后汲取了这一教训。从那以后，美国在世界上率先开放国际市场，为各国的增长与发展提供动力，帮助亿万人民脱离了贫困。但是，为了在农业、制造业以及服务业等领域进一步获得自由贸易的好处，我们仍有很多工作要做。如果多边贸易谈判打破僵局，发展中国家尤其会蒙受惠益。世界银行的研究发现，通过增加贸易，数以千万计的人可以摆脱贫困。

克里斯蒂娜·塞维拉（Christina R. Sevilla）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主管政府间事务与公共联络的副助理代表。

“我们将努力减轻贫困地区的负担，使那里的人民不再受苦—不仅此时此刻，而是持续下去。增加财富最有效的途径是增加贸易。”

—乔治·W·布什总统，
2005年9月14日

在二十一世纪，世界面临巨大挑战。超过十亿人民生活在贫困中，而贫困给家庭、社区以及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致力于共同的目标，即在全球减少贫困，争取扩大经济增长和提高生活水平，为公民创造新的工作与机会。

正当各国政府寻求突破目前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的僵局时，人们应该记取被经济理论与实践经验所证明的规律，即开放市场与贸易自由化——消除关税以及非关税贸易壁垒——是一条通向创造财富与发展的道路。那些开放贸易的国家一般更为富有，其人口更为健康，具有更高的教育水平，享有更多的劳工权利与环保标准，并

面临更多的投资机会。与此形成鲜明对照，贸易壁垒虽然可以保护少数特殊利益集团，使之免于面对竞争，但最终将使整个国家江河日下，财富流失，增长放慢，因而在解决紧迫的社会需求方面资源日益减少。

理论与证据

为什么国家之间要贸易？经济学家对自由贸易的道理了如指掌。简言之，通过重点从事本国最擅长的商品与服务生产，并与他国交换优质低价的其他商品与服务，各国都可从中得到好处。在这种安排下，各国的生产效率提高，消费者选择增多，商品与服务趋向价廉物美。消除政府设立的贸易壁垒，可使个人进入世界超市，不但获取食品、服装以及其他制成品，而且得到作为现代经济基础设施的各种服务，从金融到电子通讯，从交通运输到教育。

竞争促使企业创新，寻找新的生产工艺和技术以更好地为客户服务，并推动知识进步。例如，最近几年开放市场方面的进展以及出口机会的增加推动了工业增长，加上更加严格地执行版权与专利法，使先进的计算机技术与救死扶伤的医疗产品迅猛发展。

贸易壁垒产生的效果恰恰相反——国内行业效率降低，成本提高，质量下降，商品与服务的选择减少，创新乏力，经济增长趋缓。

二十世纪的经济发展史雄辩地展示，贸易自由化为全世界数亿人口带来了巨大好处，而贸易壁垒则导致全球付出惨痛的代价。1930年，美国错误地认为，由于外国的工资和制造成本低，美国制造商无法成功地与外国制造商竞争，因此建立了史无前例的贸易壁垒。《斯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试图以高关税壁垒保护美国市场，使之免于外国竞争。结果是灾难性的。贸易伙伴随即采取报复措施，以限制外国进口来保护本国市场。1930年代初期，世界贸易额下降了百分之七十，几千万人失业，加剧了大萧条，使政治关系趋于紧张，进而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从那以后，美国的历任总统与历届国会在关贸总协定（GATT）及其继承者世界贸易组织的构架之下，不断为和平的经济合作与共享繁荣奠定基础、建立共识。1947年关贸总协定初创时仅有23个会员国，今天的世界贸易组织已经有150个成员国，具有不同发展水平，代表着全球各个地区，此外还有二十几个国家正在寻求加入。该组织的目标始终如一：降低贸易壁垒，刺激国家之间的新的贸易往来，从而在最广泛的基础上使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好处得以充份实现。此外，贸易规则为国际商务带来确定性、透明度以及可预期性，并促进法制建设，使国家之间的贸易纠纷得以和平解决。

贸易创造财富

从实证的角度看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扩大贸易对于经济增长与创造财富都至关重要。

美国市场保持对世界开放，这是美国力量与繁荣的基石。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最大的进口国与出口国。1990年代以来，增加贸易自由度使美国的国民经济总产值提高了近47个百分点，同一时期，美国经济新增近1900万个工作机会。美国制造业六分之一以上的工作机会(约520万个)依赖出口，农业有一百万个工作机会依赖出口。出口业的平均工资比全国平均工资高出13至18个百分点。

美国家庭也从自由选择全球进口商品中得到实惠。据估计，1990年代的两个主要贸易协定——《世界贸易组织乌拉圭回合协定》以及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导致美国四口之家每年平均增加1300至2000美元的购买力。

经验证明，发展中国家开放贸易并同时推行国内市场改革大有益处，贸易自由化在促进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方面潜力巨大。世界银行的报告指出，在1990年代，降低贸易壁垒的发展中国家（每年降低百分之五），其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每年降低百分之1.4）的三倍。

关于贫困问题，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夏威尔?萨拉–伊–马丁（Xavier Sala–I–Martin）发现，在过去三十年期间，全球贫困人口的比例明显降低。据他估算，从1970年到2000年，贫困人口大约减少了2.5亿至5亿人。另一个相关变化是全球收入差距也在1980至1990年代缩小。例如，中国积极开放市场，扩大贸易，使2.5亿人脱离贫困。智利积极开放贸易，促进商务，使贫困人口减半，即从1987年的百分之四十六降至2004年的百分之十八左右。相反，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贸易相对不开放，那里的国家直至最近才着手开放市场，扩大贸易，以期缓解日益严重的贫困问题。

©AP Images/Amit Bhargava

印度等国家开始开放进口市场，使消费者在食品与其他商品上有更多选择。

据世界银行与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研究报告估计，全球实行自由贸易可使数千万人脱离贫困，并每年向发展中经济体注入两千亿美元的资金。然而，发展中国家要充分实现贸易自由化的好处，就必须把贸易与国内改革、援助项目及能力建设结合起来。

在贸易能力建设方面，美国的一项重点工作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使之受益于全球贸易体制的工具。美国是贸易援助的最大提供国，包括提供贸易相关的实物基础设施。在2001年至2006年期间，美国为此类外援累计支出56亿多美元。

贸易自由化与发展

如能通过世贸组织多哈回合的谈判进一步实现农业、制造业以及服务业的多边贸易自由化，将使发展中国家获得巨大惠益。

农业：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居住在农村地区。世界银行与经合组织（OECD）的研究指出，发达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大幅降低农产品关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如能一起消除农产品贸易的扭曲，大约三分之二的潜在惠益（百分之六十三）将属于发展中国家。世界银行的研究认为，通过消除全球农产品的贸易扭曲而导致的惠益中，百分之九十三来自减少进口关税，只有百分之二来自减少出口补贴，百分之五来自减少国内补贴。发展中国家通过消除全球农产品贸易扭曲所能得到的惠益几乎全部来自消除进口关税。

商品：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通过商品贸易自由化所能导致的全球经济惠益中，大约二分之一将为发展中国家享有。据估计，发展中国家的岁入至2015年将增加1420亿美元，占全球增长总额的百分之四十九。如果将经济体获得的动态惠益计算在内，上述增长额可达到2590亿美元，占全球增长总额的百分之五十六。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壁垒高于发达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现，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限制是高收入国家的五倍。因为发展中国家大约百分之七十的商品贸易关税是付给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所以中低收入的国家将受益于消除其壁垒，促进南南贸易。

服务业：服务业现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就业领域。在拉丁美洲、加勒比海以及东亚国家，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工作机会来自服务业。服务业是发展中国家的未来，因为它是经济产出总量中增长最快的部分，也是外国直接投资（FDI）的主要部门。服务业吸收了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百分之六十以上，从1990年的8700亿美元增长到2004年的5.9万亿美元。正因为服

©Lynsey Addario/Corbis

台湾制造的扳手得以在墨西哥城销售，说明开放贸易对这两个新兴经济体都有好处。

务业存在着广泛的贸易壁垒，故降低这类壁垒惠益巨大。例如，世界银行最近有一份报告指出，对外开放金融服务业的国家的经济成长率要比其他国家高出一个百分点。密执安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通过消除贸易壁垒所能取得的全球经济惠益中，三分之二以上的贡献将来自于服务业的自由化。

贸易与环境

贸易自由化不但能够而且应该支持可持续发展。一般而言，富裕国家倾向于投入更多的社会资源于本国的环境保护。世贸组织的多哈回合谈判为贸易与环境带来了双赢的巨大希望，即让贸易自由化产生积极的环保效果。许多重要的非政府环保组织，如海洋保育组织（Oceana）与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World Wildlife Fund）等，支持各国贸易部长将消除有害的渔业补贴作为多哈谈判的一项内容，该项补贴导致世界各大洋的过度捕捞，鱼种濒临灭绝。更重要的是，环保商品及服务的贸易自由化将支持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以更低的成本向更多的人提供关键的环保技术，如污水处理、固体及有害废物处理、水土改良、环境空气保护以及可再生能源生产等领域的技术。

智慧之路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都面临贸易政策发展方向的重要选择。全球经济迅速变化，决策者可能倾向于保护其国内市场免于竞争，设立新的壁垒，从而使某些利益集团受益，但以绝大多数生产者、工人及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但是，理论与实践均指向一条智慧之路。开放贸易是基石，它为经济增长、繁荣、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全世界亿万人民的生活品质的改善奠定了基础。

美国愿意随时与其他国家一道消除残存的贸易壁垒，从而开创真实全新的贸易，使大小企业皆得其惠，工人、农民与家庭皆受其益。对于正在寻求更大自由、更多机会以及脱贫之路的亿万人民，贸易的好处尚未变成现实，这意味着扩大国际市场义不容辞。

保护主义与政治

布鲁斯·斯都克斯（Bruce Stokes）

Joseph Keppler and Frederick Opper, Puck Magazine, 1896年6月3日

保护主义从来喜争好斗。这幅漫画讽刺1896年美国总统候选人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的保护主义竞选纲领。

保护主义源远流长。面对政治压力，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曾保护过本国的纺织工业、汽车工业、农业及其他行业的生产者，使之免受来自进口产品的竞争。在某些地方，农民虽然人数少，但仍受到保护，因为他们在选举中具有很大影响力。由于保护主义是政治问题，因此必须从政治上寻求解决方案。

布鲁斯·斯都克斯 是《国家期刊》(National Journal)的国际经济专栏作家。

保护主义——即政府保护本国制造商、使之免受国际竞争的做法——在世界各国的政治中根深蒂固。它既是特殊利益集团所导致的结果，也是一般公众对于变化感到忧虑的反映。伴随保护主义的是巨大的经济代价。

对贸易自由化的抵制及其政治根源并非新近才有。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实施进口关税以“保护”英国农民与地主，使之免受来自廉价进口谷物的竞争。但是，这些进口税使得英国城市的食品价格飞涨，强迫不情愿的工厂主支付更高的工资，以保证工人能够吃上饭。1846年，议会内经过长期斗争，这些谷物法案终被取消。该事件标志着英国新兴中产阶级的政治崛起。

围绕关税的类似斗争也曾在十九世纪很长一段时间内主导美国政治。在走向美国内战（1861–1865）的过程中，北方各工业州需要提高关税来保护其新兴的制造业，使之免受来自欧洲的竞争，但南方各州则要求低关税，因为他们要进口大部分消费品，包括布匹和农业机械。1861年，杰弗逊·戴维斯（Jefferson Davis）当选为主张与北方分离的美国南方邦联的总统，在发表就职演说时，他用了大量篇幅来谈低关税的必要性，而非黑奴问题。该事例充分说明了这场斗争的重要性。

大半个世纪之后，政治因素推动的保护主义成为世界各国对大萧条的回应方式。在1928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承诺提高农产品的进口关税，以帮助多年来因农产品价格下跌而遭受损失的美国农场主。当胡佛所承诺的法案进入国会程序时，工业部门的特殊利益集团又纷纷加上对自身有利的关税保护条款。

©AP Images/Claude Paris

法国农民的抗议活动，该国政治体制使农民在选举中的影响大大超过其人口比例。

其结果是1930年6月通过的《斯穆特一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该项立法将美国关税提升到历史最高水平。其他国家随之实行了报复关税，导致全球商务大幅滑坡。至1934年，世界贸易额仅为1929年的三分之一。

纺织品与服装

半个世纪以来，经过旨在降低关税的全球贸易谈判，当代保护主义远不如过去那样极端化，但其政治性并没有减弱。农业、工业及服务业的利益集团仍然抵制市场自由化，因为它们要保持自己在国内市场的垄断地位。它们害怕外国竞争会带来低价格与技术创新。

直至最近，纺织与服装业在世界各国一直受到保护，成为既得利益集团自我保护、免受进口竞争的经典案例。对布匹以及成衣贸易实施限制始于1950年代，当时，发展中国家开始与欧美制造商竞争。1974年的《多种纤维协定》（Multifibre Agreement）为纺织品贸易规定了具体的进口配额与关税。这项保护措施使美国消费者每年多支付200多亿美元，提高了衬衫、裤子以及内衣的价格。世界银行估计，上述进口限制在欧美国家每保护一个就业机会就相当于在穷国剥夺35个工人的就业机会。

然而，由于美欧纺织品与服装制造商以及工会的政治影响力，这种贸易限制一直维持到1993年，这一年富裕国家终于同意取消限制。但即使如此，这种保护又经过十年才寿终正寝，也就是直到2005年，在保护主义实施了半个多世纪之后，纺织与服装业的贸易最终实现了自由化。然而即使在今天，有些产品仍面临极高的关税。

保护汽车制造商

保护措施也可影响诸如汽车等高价值产品。在不同时期，日本、韩国、中国以及美国的强大的政治利益集团曾为汽车行业提供保护。

1970和1980年代，日本汽车制造商积极进军美国市场，美国的汽车工业首次面临外国竞争的挑战。随着日本汽车不断提高市场占有率，美国的三大汽车制造商——福特、克莱斯勒与通用——说服联邦政府采取措施，规定日本汽车运抵美国的最高配额。1981年，里根政府同意实施这种限制，尽管里根总统信奉自由市场的原则，这是因为汽车及其零部件行业是美国国内的重要雇主。更重要的是，其就业人口集中在一些政治上举足轻重的州——密执安、俄亥俄与伊利诺伊——因此对国会与总统选举影响巨大。

每年的进口限制具有扭曲效果，即鼓励日本汽车公司调整运抵美国的汽车品种，多运利润丰厚的高档车，少运小型廉价的轿车。据估计，在1980年代初期的高峰期，该项配额导致每年50亿美元的额外利润转移至日本汽车制造商之手，后者可以高价销售受配额限制的轿车。尽管有此保护，美国汽车工业继续丧失市场占有率，让位于日本产品，因为丰田、日产以及本田干脆越过贸易壁垒，开始在美国生产汽车。

这种政治影响力导致保护主义政策的情况不仅发生在美国。以韩国为例，来自日本、欧洲及美国的汽车制造商2005年仅在韩国销售了三万辆轿车，占该国汽车市场的3.3%。同年，韩国制造商在国外销售了150多万辆轿车。韩国的百分之八的关税以及引擎马力税加起来，使售价为三万美元的进口轿车额外加价九千多美元。更有甚者，直至最近，韩国政府对购买外国轿车的人进行税表审查，这显然是不鼓励购买外国产品。

超比例的投票权

特殊利益集团影响贸易政策之能力以及该影响力能否持续取决于制订贸易政策的宪政结构、现代社会中不断变化的政经制衡机制以及有关世界贸易问题的公众舆论之演化。特殊利益集团常常可以操纵政治体制，是因为后者反映过时的经济政治现实。

在美国，众议院的议员代表人民大众。大约每65万公民产生一位众议员。参议院的议员代表地域，每个州产生两位参议员，无论人口多少。这种安排体现了18世纪制定《美国宪法》时的一项交易，即平衡大小州之间的利益。然而在二十一世纪，这导致农业利益集团在参议院具有超过其人口比例的影响力，强化了对美国农业补贴的支持，导致贸易扭曲。

宪政结构向保护主义倾斜的情况并非美国一家。虽然法国从业农民仅拥有不足该国百分之四的选票，但他们的高投票率使之在全国选举中占有效选票的百分之八。法国的选举体制使农场主具有超过其人口比例的当选机会。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市、镇长是从业或退休的农场主。因为法国参议院议员是由城镇议会间接选举产生，毫不奇怪，农场主在上院获得超比例的席位。农场主在参议院的席位百分比不仅超过其总人口的百分比，而且这个差距在过去四十年期间几乎增大一倍。

法国总统选举体制的特徵意味着总统候选人难以忽略农场主的利益。此外，复选体制意味着得票最高的两个候选人要进入第二轮投票，这使农场主——大多属于政治右翼——在选择保守派候选人时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比如，1988年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在保守派阵营的第一轮投票中胜出，其中四分之一的票来自农场主。毫不奇怪，希拉克常常被看作是农业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法国政治体制的这些特点使另一些强势的区域工业，如纺织业与电子业，可产生同样的压力。这导致雇主协会（Patronat）——法国工业界首屈一指的贸易协会——处于弱势地位，并有效消解了它反对农场主游说及保护主义势力的声音。

同样，在韩国的国民议会中，代表农民的议员享有的代表权是实际农业人口比例的三倍。农业选民的超比例影响力导致食品进口的高关税，而韩国消费者被迫支付全世界最昂贵的牛肉、水果及蔬菜价格。

但是，日本的经验显示，改变宪政结构就可以转变驱动保护主义的政治因素。在1980年代之前，日本议会的选区席位反映二战之后的人口分布，即三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三分之二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到了1980年代，日本四分之三的人口居住在城市。结果是，在选举国会议员时，五个城市居民的选票相当于

©AP Images/Itsuo Inouye

日本农场主反对开放本国农业市场、允许更多外国竞争的贸易协议。

一个农村居民的选票。农村影响力的一个副产品是百分之七百的稻米关税以及全世界受保护最多的农业部门。

1994年，日本进行了选区改革，大大缩小了立法代表的城乡差别。选票力量的均势变化使二战以来主导日本政治的自由民主党发生转变，即从一个以农村为基础的政党转变为侧重城市及郊区的政党，并形成新的政策重点。日本政府的补贴从农场主转向城市居民。虽然日本离开放经济体仍有很大距离，但其进口量已经大幅度增加。

公众的矛盾心态

公众对国际商务的根深蒂固的矛盾心态是贸易政治的驱动力。

全世界各国人民原则上都同意全球化对家庭与国家有利。2002年度的皮尤全球态度调查（Pew Global Attitude Project）显示，在接受调查的44个国家中，25个国家有至少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认为全球化是好事。非洲人虽生活于最贫穷的大陆，但态度最乐观。百分之七十的乌干达受访者表示，增加国际商务对他们的国家有好处。大约三分之二的尼日利亚人同意这一看法。同时，半数以上的越南人认为国际化是好事情，越南经济的成长速度在亚洲名列第二。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erman Marshall Fund）最近的一项民调显示出欧美人对贸易的矛盾心态。2006年，百分之七十的美国人表示赞成国际贸易，比2005年的三分之二有所提高。欧洲过去的贸易支持率也是三分之二，但现在已增加至四分之三，超过了美国。但是，过半数法国人以及近三分之一的美国人不赞成进一步提高贸易自由度。一半的德国人以及五分之三的美国人与法国人认为，更自由的贸易将导致失业人口增加，而因此创造的就业机会相对较少。

总体而言，美国人与欧洲人似乎在原则上是自由贸易者，但在实践中则是保护主义者。例如，对那些赞成自由贸易理念的人而言，如果关税可以保护本地的就业机会，他们就会支持征收钢材进口税。

保护主义的悲剧在于它增加国家的经济成本，对贫困国家而言尤其如此。世界银行最近的一些研究得出结论：发展中国家减少保护主义壁垒的做法导致经济成长率提高1.2到 2.6个百分点。更重要的是，推行贸易自由化措施后，投资加速增长，商品与服务出口迅速扩张。

尽管存在上述经济惠益，但从保护主义的政治根源与悠久历史来看，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贸易壁垒仍将对经济的健康发展构成障碍，而如果要克服保护主义，就必须从政治入手。

本文表达的意见不一定反映美国政府的观点或政策。

发展中国家需要相互开放市场

杜大伟（David Dollar）

©AP Images/The Eng Koon

自从向东南亚邻国开放进口市场以来，马来西亚汽车购买者的选择多了。

多边贸易谈判的僵局使发展中国家无法获益，但可能获得的惠益中有一半取决于发展中国家相互改善市场准入。虽然富国必须减少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贸易壁垒，但发展中国家相互减少壁垒将能带来更大的好处。

考虑到三分之二的工业品关税是发展中国家相互支付的，所以推进贸易自由化将可吸引外国投资，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长。完成多哈回合的贸易谈判要求发展中国家发挥真正的主导作用，尤其是受益于全球化的发展大国。

杜大伟（David Dollar）是世界银行中国和蒙古处处长。

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陷入僵局，很可能彻底破裂。这一回合的贸易自由化原本应该是世界贸易组织的“发展回合”，尤其要让发展中国家受益，因为发展中国家有10亿人口每天生活费不到一美元，有26亿人口低于每天两美元。新一轮的贸易自由化将如何帮助贫困国家呢？

开放农业市场

显而易见的问题——也是最令人关注的问题——是富裕国家实行的农业保护措施。日本保护稻米及其他农产品市场。美国与欧洲补贴并保护农场主。据世界银行的最新估计，如果富裕国家实现农业市场的全面自由化，将立即使发展中国家获益260亿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富国每年向贫困国家提供的总援助额的二分之

一。因此，富裕国家开放农业市场是十分重要的。

鲜为人知的事实是，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相互开放农业市场而同样获益，每年获得的惠益可达280亿美元，略高于上面的数字。产生该惠益的部分原因是：贸易自由化致使各个国家能够在自己擅长的领域扩大商品及服务生产，并以更好的价格出售。贸易的另一个好处在于，消费者能够以更低价格购买本国不擅长生产的商品及服务。

此外，发展中国家的自由化将刺激南南贸易——即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以使其他贫困国家获益。在实行自由化的地方，主要食品市场的自由化尤其有助于消除贫困，因为在发展中国家，此类商品占贫困家庭支出的很大一部分。

削减工业品关税

虽然许多贸易讨论集中在农业问题上，但推动工业产品的市场进一步自由化同样是重要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现已成为制造业的高效生产者，特别是在劳动力密集的纺织业与电子业等。事实上，发展中国家百分之八十的出口产品来自制造业。

工业品的最大市场在富裕国家，其进口关税已经较低。发展中国家厂商目前所支付的工业关税有三分之二是付给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品进口关税一般较高。

因此，发展中国家通过彼此改进市场准入将获得巨大惠益。它导致高效企业扩大生产，实现规模效益，并鼓励进一步分工，一如我们在欧洲最近几十年的整合中所见。

对某些人而言，"发展回合"或许意味着当前回合的关键目标是让富裕国家消除对贫困国家商品的壁垒。但是，这样做只能使发展中国家获得开放贸易系统的潜在惠益的一半，另一半来自发展中国家相互改善市场准入。

动态惠益

以上谈到的惠益被经济学家称为"静态惠益"——即基于现有生产能力可迅速实现的收益。全面贸易自由化将导致发达国家减少某些农产品的生产，而这些生产将在具有充足土地与水源的发展中国家得以扩大。此外，发展中国家将扩大劳动力密集的制造业的生产与出口，而发达国家的生产将转向重型机械、技术密集的产品以及服务业。但是，在上述静态惠益之外，还有重要的动态惠益。动态惠益很难量化，但很可能比静态惠益更重要。

所谓动态惠益是指：与更大的全球市场相连接，可刺激企业创新并提高生产力。创新并非仅仅是重要的技术突破，它往往是企业生产过程及产品的小的改变。在受保护市场中，企业容易满足于现有成就，而大规模的竞争性市场则为好的想法以及高质量生产创造条件。

此外，大规模市场促进分工的细密化。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在降低制造业产品的进口关税之后，将会发现该国企业成为全球生产网络的一部分，在该网络中，不同国家的各种元件与生产活动构成同一件终端产品。

为加入复杂的全球生产网络，发展中国家需要具备以下投资环境：企业的创立和扩展相对容易；交通设施提供与外部世界沟通的便利；海关具有高效率。

最后，多哈回合力图解决服务业贸易自由化的问题。许多现代服务业，如金融、保险、物流、港口管理、运输服务等，对改善投资环境贡献很大。开放上述现代服务业的进口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建立富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使本国企业得以更好地利用全球市场的各种机会。

©AP Images/Ben Curtis

莱索托的这家服装厂受益于消除南部非洲关税同盟（Southern African Customs Union）成员国的邻国贸易关税。

需要政治领导力

这一回合的贸易自由化范围极广，将为世贸组织的所有成员国提供好处。既然如此，为什么如此难于达成协议呢？

众所周知，贸易自由化的政治问题是：进一步开放市场将让所有人口广泛受益，但是导致某些特定行业承担很大的转型成本。于是富国受保护的农场主展开游说，反对该部门的贸易自由化。同样，发展中国家受保护的工业企业及服务业也进行游说。因此，达成协议需要各国展现真正的政治领导力。

此外，出于明智与人道，应该注意受损失者，并设计尽可能好的补偿方案以确保顺利转型。许多国家建立与转型相关的协助项目，帮助工人再就业或迁居，使他们充分利用扩大贸易带来的各种机会。

以往各回合的贸易自由化也曾几近失败，然后在最后一刻达成协议。为了贫困国家的利益，我们衷心希望各国普遍展示政治领导力。多哈协议将要求美国、欧洲以及日本在农业保护问题上做出重大调整。但是，它也要求发展中国家展现真正的领导力，特别是那些在全球化中获益匪浅的发展大国。推动工业品与服务业的贸易自由化完全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但是，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必须说服自己的人民，并设计明智的方案帮助那些在转型过程中利益暂时受到损害的人。

本文表达的意见不一定反映美国政府的观点或政策。

消除工人对贸易的恐惧

戴维·费尔德曼（David H. Feldman）

©AP Images/Edgard Garrido

正像这位尼加拉瓜的工人，发展中国家的劳工不但需要基本的社会安全保障，更需要一个教育体系来培训他们，以适应飞速的变化。

尽管全球经济在扩展，但劳工以及代表劳工的政府对贸易的忧虑也在增加。大多数因工作场所变化而导致的失业可归因于技术进步，但进口增加却日益成为众矢之的。保护主义是错误的应对方式。人们建议政府采取更好的办法，消除工人的忧虑。

戴维·费尔德曼（David H. Feldman）是美国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Williamsburg, Virginia）威廉与玛丽学院（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的经济学教授。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呼吁国际社会为濒临绝境的多哈回合谈判注入新活力，因为他担心谈判失败将导致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险象环生。真正的困难远超出多哈回合谈判的具体问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同样的困难，即全球经济一体化产生社会收益这一观念日益具有争议性。结果是，许多国家越来越倾向于使用歧视性的、扭曲贸易的做法，以此作为权变政策的工具。

反倾销行动，用临时关税及配额应对进口激增，生产补贴，以及扭曲贸易的法规等，这些做法在经济增长停滞的时候是不难理解的。除非经济增长能够制造大量机会而让其他行业迅速吸收劳动力，否则，任何贸易让步或经济振荡，或两者兼而有之，势必会导致进口竞争行业的明显损失，对技术经验与其从事的工作紧密相联的劳工来说尤其如此。故上述政策可以用来维持现状。

经济体中任何一个有一定规模的部门出现快速萎缩，都难免有政治后果。但是，在全球经济增长强劲有力的时代，人们对于开放的全球市场以及多边规则却信心大减，令人颇感意外。谜语的答案是日新月异的技术变迁。

技术变迁与就业恐慌

在过去60年中，我们目睹制造业领域发生了节省人力的重大技术变化。自1950年以来，就高度发达经济体而言，制造业领域的生产力平均每年增长3到5个百分点。在同一时期，制造业领域的就业几乎没有增长，甚至出现了萎缩。这导致制造业的就业比重下降，而服务行业的就业比重则相应提升。

与此同时，全球交通成本降低，促使制造业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不断增加。最近，服务业的外部采办导致许多国家的公司调整经营结构。

众多发展中国家面临城市扩张，以及传统农业及小规模家庭手工业让位于全球市场的细密分工，从而经历着同样迅速的结构变迁。

所有这些振荡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经济部门感受到国际竞争的现实或潜在威胁，而这种看法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皆属常见。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人们担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日益增长的贸易将成为始作俑者，导致美国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以及欧洲的高失业率。然而，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等人则认为，上述现象可能是因为对非技术劳力的国内需求在不断下降，而这很可能是向技术劳力倾斜的技术变迁并所造成的。国际经济一体化可能对劳动力市场变迁的时机产生些微影响，但这些变迁无论如何都会发生。

然而，因缺乏就业保障而产生的公众忧虑则集中在贸易自由化上，这大概可归因于在那些面临激烈进口竞争的行业，就业机会流失所造成的损失往往很大。但是，各国政府不应该以下述方式应对这种不安全感，即放弃与世界市场保持开放交流的原则承诺，或倚重行政保护及优惠特定国内公司或经济部门的政策。

保护主义解决方案存在的问题

在各个国家内，重大竞争均非发生在国内公司与外国竞争者之间，而发生在国内公司之间，为了争夺国内稀缺的劳动力与资本。贸易壁垒与国内补贴可能会提高产出，增加就业，并提高国内某些企业的利润，但是，这势必以损害未受补贴保护之优惠的其他国内公司为代价。如果享受优惠待遇的行业的利润来自于国内的高价格而非高生产力，那么，这个利润就代表着该国其他人的收入损失。国民总收入并没有增加。

这些政策制造一种对立，一方面是国内消费者和使用进口中间投入品的公司，一方面是与进口产品相竞争且与政界关系密切的生产商。正因为保护政策常常不透明，且制定过程深藏不露，所以它导致特殊利益集团的游说规模日益扩张。这种不事社会生产却追求巨额利润的现象往往导致社会收入的重新分配，劫贫济富，并将稀缺资源从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的部门分散转移。

贸易开放具有一个优势，即与被利益集团的压力所扭曲的价格相比，世界市场的价格一般会更准确地反映稀缺状况。世界市场的价格能更有力地激励国内消费者与公司有效运用资源，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国民收入的价值。在更为开放的经济体中，公司与消费者通常享有更多优质产品的选择，而如果技术体现于进口投入

品以及外国投资，那么技术推广的速度就会更为迅捷。

贸易开放的另一个优势是，它减少高度集中的国内产业在该国的市场力量。开放是行之有效的鼓励竞争的政策，对小规模的发展中经济体尤其如此，那里的许多行业不过是一两家大公司。

最佳应对方式

在公共部门相对发达的国家，劳工对就业保障的忧虑可通过一系列有的放矢的项目来消除。某些老办法可以使心存疑虑的立法者更容易接受贸易协议，如增加贸易转型援助（TAA），该基金专用于重新培训因贸易而失业的劳工。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贸易转型援助的行政程序十分复杂，有时不能惠及饱受贸易冲击且最需要帮助的劳工。那些旨在使贸易自由化重新焕发活力的项目必须做到直接消除造成职工担忧的根源，并争取惠及更多人。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高级研究员洛丽·克莱策（Lori Kletzer）与布鲁金斯学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高级研究员罗伯特·李顿（Robert Litan）为彼得森研究所撰写了一份政策论文，呼吁为所有失业工人建立新的安全保障网络。该建议的两个支柱是，为符合条件的再就业职工提供工资保险与医疗保健补贴。虽然他们的论点直接针对美国的状况，但是他们提出的观念，即以提供社会保险来消除失业的后顾之忧，具有广泛的适用性。现行失业保险不能消除人们对再就业的工资损失的恐惧，此外，应该在再就业时才支付保险福利，这将有助于缩短失业时间，加速在工作岗位上发展新技能。

另一个办法是扩大再培训的税收优惠。为此，公司可以将合乎要求的职工培训项目的费用分若干年承担，而个人可以从符合要求的教育项目支出中获得减税及退税。

在众多发展中国家，公共部门的管涉能力十分有限，显而易见，政府也有比工业政策与贸易管理更重要的优先任务。其中一个优先任务是建立健全的财政体制，保障税法明确并由独立公正的司法部门执行，从而做到税收有效及公正。此外，扩大税基可以使政府增加税收，同时降低导致逃税与政府腐败的高税率——包括高进口税与高所得税。

健全的税收岁入基础，将使发展中国家政府有能力从事许多非他莫属的工作。必须为年轻人建立入学升学的基本框架，特别是在中小学水平。比较优势是一个不固定的目标，鉴于最近发生的飞速变迁，职工应该具备可转化技能，使他们在职业生涯中可从事多种行业的工作。基本的医疗保健应该进一步得到普及，防止那些可预防的慢性病干扰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最后，每一个公民应该依托于基本的社会保障网络，避免就业恐慌转变成对世界市场变化的恐惧症。

帕斯卡尔·拉米或许是正确的。多哈回合谈判如果失败，将有某种风险，可能会导致一波闭关自守的政策乃至“以邻为壑”的策略，如竞相贬低货币，增加保护壁垒等。另一方面，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未来与其说取决于全球谈判进程，不如说取决于各国如何应对国内的失业恐慌。

本文表达的意见不一定反映美国政府的观点或政策。

正确汲取保护主义的教训

盖瑞·豪夫鲍尔（Gary Hufbauer）和康斯坦丁诺·皮切达（Costantino Pischedda）

惨遭战争破坏的东亚经济体曾一度以保护主义政策振兴经济。但是发展中国家今天不应该误读历史。日本、韩国与台湾只有在开放进口市场时，其经济才实现持续的快速增长。残存的保护主义壁垒只会损害这些卓著成果。

盖瑞·豪夫鲍尔（Gary Hufbauer）是华盛顿特区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雷金纳德·琼斯（Reginald Jones）高级研究员。康斯坦丁诺·皮切达（Costantino Pischedda）是彼得森研究所的研究助理。

©AP Images/Hiroshi Otabe

经济学家证明，随着进口增加及保护主义堡垒减少，日本的生产力提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从赤贫一跃而成显富。回顾历史，日本、韩国与台湾有时被描绘为以保护手段扶植发展的历史样板。的确，所有这些国家在战后头十年的窜升中都在不同程度上采取过保护主义政策。自由贸易的怀疑论者因此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保护手段曾经在这些国家行之有效，那么为什么今天亚非拉穷国不能采取同样的办法呢？

理论分析

贸易保护的理论依据是政府干预可以纠正种种市场失灵现象。以下是几个实例：

如果企业甲的活动使企业乙无偿获益——如创造一个训练有素的劳工队伍供企业乙雇用——那么企业甲就可能在培训方面投资过少。政府若提供补贴帮助企业甲支付培训费用，将可使整个生产体系受益。

如果边干边学是成功的关键，那么企业只有获得广泛的生产经验，才能具有国际竞争力。但在学习期间，企业可能蒙受巨大的金融损失。除非远见卓识的资本市场提供足够的信用，否则政府扶持企业起步就是必要的。

企业甲（如采矿公司）只有在企业乙（如铁路公司）建成后才能获利，反之亦如此。政府可帮助协调上述两个企业的商务关系。

上述三个实例描述了可能为政策干预提供正当理由的市场失灵现象。而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理论假设在实践中是否重要。毕竟，在保护主义辩论中站在另一边的人也能引述大量理论依据：戴维·里卡多(David Ricardo)的比较优势理论，业已被证明的竞争提升效益的理论，以及被广泛认可的保护主义滋生腐败的危险。

©AP Images/Lee Jin-man

韩国解除高贸易壁垒后，技术密集型产业随即欣欣向荣。

实例之一——日本

日本经济复苏的第一个阶段是从二战结束到朝鲜战争结束期间（1945－1955），其间经济飞速增长。政府对关键部门予以保护，作为旨在恢复战前工业水平的总体产业政策的一部分。政府政策侧重于遭受重创的重工业，如钢铁、化工以及交通设备。

回顾这段历史，日本的复苏并不困难，因为战前的专业知识、技术管理人才以及企业网络基本完好无损。日本缺乏的是国内储蓄与外汇，无力重建物质资本储备，无力从国外进口投入品和技术。政府干预无疑增加了储蓄并管制了外汇。这些目标的实现可能加速了战后的复苏进程，但并没有创造复苏。

在第二阶段（195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逐渐自由化（农业除外），而经济仍快速增长，日本很快成为技术进步的国际先导。贸易限制对于日本的持续成功无甚帮助。事实上，经济学家在对日本各产业进行逐一分析后表示，实际保护与出口业绩呈负相关。

同样，经济学家展示在1955年至1990年期间，实际保护程度与生产力呈现负增长相关。这些学者还发现，进口水平与生产力呈现正增长相关。至少有两个原因可解释上述结论。进口新型优质中间投入品可提高当地企业的效益。此外，进口使当地企业面临竞争，能激励管理者改善效绩。不错，日本经济增长成就突出，但如果政府对国内企业的保护较少，那成就可能会更大。

实例之二——韩国

朝鲜战争（1950－1953）使韩国的工厂设备遭受重创，但劫后余生的工人将技术带到战后时代。在此后的十年中，政府保持保护主义观念，不但高设贸易壁垒，而且人为提高汇率。但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韩国领导人调整了各项政策，趋于外向发展。贸易、税收、信用、汇率等激励措施多管齐下，促使韩国经济向出口导向转变。

在1961至1980年期间，韩国实际出口额每年增长近二十四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出口在韩国经济产出中的比重从百分之五猛增到百分之三十三。虽然产业发展的初步阶段侧重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但从1970年代初期开始，韩国步入了发展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第二个阶段。今天，韩国业已成为电器、机械、钢铁以及汽车的重要出口国。

然而，遗留的保护手段阻碍了韩国的整体发展。有关韩国38个产业从1963年到1983年的统计数字显示，保护手段与生产力负增长指数相关。位于首尔的韩国大学的经济学家李中华（Jong-Wha Lee）指出："韩国的数据证明了减少贸易干预与提高生产力之间的关联。"事实上，老掉牙的特殊利益而非经济收益核算，更能说明韩国的保护模式。

实例之三——台湾

台湾经济复兴可分为两个阶段。首先，从1949年内战结束至1950年代末期，台湾政府高设关税以及非关税壁垒，以限制进口并扶助国内产业发展。

在第二个阶段，即1960年代和1970年代，台湾领导人转向外向型政策，大力开放进口并纠正高汇率。他们认识到，由于台湾国内市场规模小，内向模式限制了经济增长的前景。

在外向发展阶段，台湾的出口迅速增长。出口在经济产出中的比重从1952年的8.5%窜升至1976年的44%。1955年制造业出口在总出口中所占的份额还不到8%，而到1976年则高达91%。

在第二个阶段，台湾保留了一些贸易壁垒（在农业领域尤为突出），但遗留的保护措施是对特殊利益的妥协，对经济增长则毫无贡献。台湾能实现增长并非因为限制性措施的存在，而是因为克服了限制。多项研究发现，台湾的贸易保护是出于政治考虑，而不是市场失灵引起的。

汲取经验教训

战后日本、韩国与台湾的经验说明，长期快速的经济增长与不断自由化密切相关，与持久保护无缘。在经历最初的内向型发展阶段之后，这三个国家相继开放经济并参与国际竞争。正因为如此，它们取得了世界历史上罕见的经济增长率。保护主义不是一夜之间就能消除的，有证据显示，遗留的保护手段损害了优异的整体表现。

赞成高贸易壁垒的人或许会争辩说，东亚经济增长始于保护主义政策。这种说法虽然没错，却未能区分增长过程的起步阶段与长期持续增长。上述三个实例的发展皆始于战后重建。初期的经济增长不过是使这几个东亚经济体恢复到战前水平。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已故经济学家贝拉·巴拉萨（Bela Balassa）是出口导向增长的著名倡导者，他承认进口替代在韩国与台湾经济增长的初期发挥了正面作用。但是，保护的正面作用仅限于短期，即以国内生产替代消费品进口的阶段。这个阶段一旦结束，东亚经济体便需要对世界市场开放——既是为获得中间投入品，也是为大规模扩大出口。就人均经济产出增长率而言，出口导向时期高于进口替代时期。以韩国为例，1955年至1965年期间的人均经济产出年增长率为2.2%，在此后十年中则达到8.2%。

自此，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早已超越单纯实行进口替代的阶段。在2006年（而非1946年），发展中国家应从东亚的历程中吸取的经验十分明确：为实现可持续增长，必须不断降低对世界贸易的壁垒。

本文表达的意见不一定反映美国政府以及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观点或政策。

清楚明白的改革模式

乔纳森·金博尔（Jonathan Kimball）

许多前苏联阵营国家在加入欧盟(EU)的过程中开放了市场，但有少数国家并没有这样做。两者之间的经济发展情况截然不同，发人深省。

乔纳森·金博尔（Jonathan Kimball）是美国商务部(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中欧及东南欧事务司司长。

©AP Images/Bela Szandelszky

杰尔（Gyor）市奥迪(Audi)汽车制造厂每年生产5万辆汽车，说明匈牙利欢迎外资。

柏林墙倒塌17年之后，自主的、自由市场民主体制在中欧及东欧地区生根开花，包括属于前苏联的波罗的海国家。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斯洛伐克以及斯洛文尼亚已经是欧盟成员国，而罗马尼亚与保加利亚也于2007年1月1日加入欧盟。欧盟成员国地位固然能够体现对于该地区里程碑式巨变的国际承认，但贸易自由化作为入盟进程的一项关键性内容，将对该地区人口的福祉产生更为深刻的长远影响。

相形之下，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白俄罗斯、摩尔多瓦与乌克兰位居未加入欧盟的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最西面，但因为没有实行上述国家的贸易自由化政策，故收获迥异。事实上，在过去15年中，它们的经济虽然有所增长，但没有像西边邻国那样受益于资本与外国投资的流入。在某种意义上，这可归因于其不同的历史情境，缺乏改革的政治承诺，或许更重要的，缺乏有说服力的外部力量推动贸易自由化，如加入欧盟的可能性。但是，真正缺乏的是一种严肃的承诺，即消除抑制贸易增长及外国投资的非关税壁垒。非贸易关税壁垒的作用如同一道保护主义的城墙，仅优惠人熟地熟关系熟的本地公司，致使其市场占有率上升。

比如，罗马尼亚与保加利亚只有在真正着手消除非关税壁垒，诸如薄弱的知识产权执法、使企业无法与政府沟通合作的臃肿的官僚体制、不透明的政府采购制度以及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后，该国经济才峰回路转，外国投资者涌入市场，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得以起飞。

对摩尔多瓦、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国而言，应该遵循的模式非常清楚，即中欧与东欧国家的模式。这些国家的经济之所以扩展，是因为开放经济以引进外国竞争，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并开始影响深远的结构改革。该地区所进行的关键改革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降低关税：降低关税是将竞争引进市场的重要手段。价廉物美的商品迫使低效公司从市场出局，并要求生存下来的公司运用创新高效的生产方法。

©ANDREI LIANKEVICH/epa/Corbis

与开放贸易及投资市场的邻国相比，白俄罗斯的经济增长相对缓慢。

物价自由化：虽然政治阻力重重，但放开物价是施加市场压力的关键手段，从消费品到能源的所有生产商，概莫能外。此外，消除补贴使外国产品径直进入市场，而无需面临阻碍自由竞争的附加壁垒。

私有化：弱化国家对生产资料的控制作用能使各公司以更有效的方式应对市场周期。此外，私有化允许政府摆脱拖累国家财政的亏损企业，将外国投资者吸引到该地区各经济体。

建立独立的监管机构：努力减少政府对监管决策的影响，是建立有规律的市场经济的关键。当政府大量投入于市场时，腐败与政治干预就很容易发生。在金融、电信与能源部门，这一点尤其重要。

健全的财政及货币政策：控制通货膨胀对于发展可预期的、稳定的市场至关重要。与此同时，有限度、有效益、负责任的政府支出极其重要，在引进市场原则的过程中，可起到指导及缓冲作用。

上述改革成果备受瞩目。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 2006年9月的数据资料，在1993年至2005年期间，中欧与东欧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购买力计算）平均增长了112个百分点。相比之下，白俄罗斯、摩尔多瓦与乌克兰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同期仅增长了48个百分点。

此外，这些具有深远意义的改革还吸引着外国投资者。外国投资者无论是通过私有化、合资还是建新厂的“绿地”投资而进入经济体，都能为转型经济体带来就业机会、知识技术以及可观的税收。其结果是，在臃肿的国有企业进行精简或拍卖重组时，外国投资者受到转型经济之可预期性的吸引，帮助填补了就业空白。虽然白俄罗斯、摩尔多瓦与乌克兰落实了上述部分改革措施，但由于缺乏执行新法规的真正承诺，导致外国投资处于较低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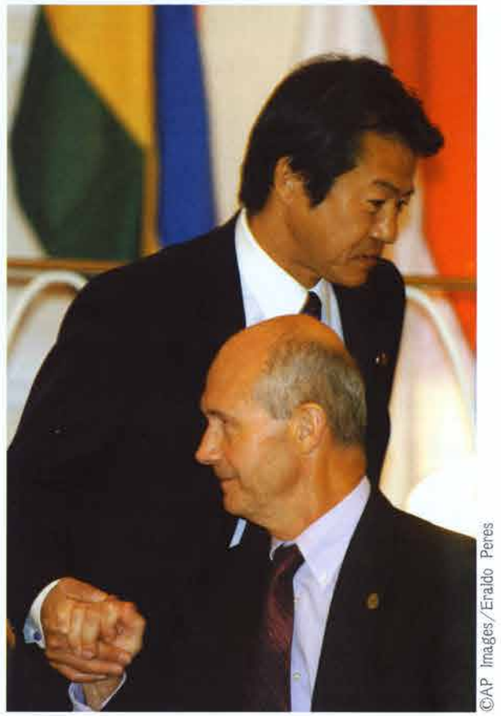
欧盟新成员国的经济转型远未结束。在整个地区，必须遏制腐败，精简官僚机构，使公共采购更加透明，并解决其他非关税壁垒问题。但是，自1989年以来开始实行的贸易自由化以及深入的结构改革所带来的强劲而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故应不会出现倒退。这种可预期性——为白俄罗斯、摩尔多瓦与乌克兰所不具备——营造着吸引国内外资本的投资环境，进而促使就业及经济增长，乃至一个富裕强大的中产阶级的形成。这些都是现代化全球经济的先决条件。

世界贸易组织如何反对保护主义

卡拉·希尔斯（Carla A. Hills）

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多种方式反对保护主义。成员国承诺遵守世贸组织反保护主义的贸易规则，并且不时展开协议与规则的进一步谈判，以不断消除阻碍贸易的保护主义壁垒。成员国还利用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来执行协议与规则，并确保新成员国从一开始就承诺摒弃保护主义。

卡拉·希尔斯是Hills & Company国际咨询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她曾在1989年至1993年期间担任美国贸易代表。



©AP Images/Eraldo Peres

在寻求打破多哈回合谈判长期僵局的巴西会议上，日本农业大臣中川昭一（Shoichi Nakagawa）与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握手。

世界贸易组织的职能远远不限于监管世界贸易。它以下述方式鼓励贸易自由化并反对保护主义：

- **原则与规则**
- **多回合贸易谈判**
- **解决争端**
- **加入程序**

上述四个要素相结合，使世界贸易组织成为战后最成功的多边机制以及我们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强大的堡垒。

贸易规则

今天，世界贸易组织根据总篇幅达400页的详细的贸易协议进行贸易管理，其中包括《关贸总协定》（GATT）与《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以及由150个成员国认可的22000页的承诺日程表附件。

于1940年代末经谈判达成的《关贸总协定》规定了管理世界贸易的各项规则与原则。其核心是两个非歧视性的基本原则——国民待遇与最惠国（MFN）待遇。

国民待遇要求世贸组织成员国对其他成员国的商品与服务给予本国商品与服务所享有的优惠。

最惠国待遇是说，世贸组织成员国必须将对某些成员国的优惠（如低关税）一视同仁地给予所有成员国。

保持对这些核心原则的承诺，有利于保持全球市场的开放。国民待遇意味着，一个国家如果允许国内生产及销售某类产品，就不能禁止这类产品的进口。最惠国待遇意味着，当一个世贸组织成员国同意对另一个成员国降低进口关税时，必须同时给予所有成员国这种优惠。

贸易回合

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不仅就全球贸易的某些规则达成共识，而且同意通过一系列多边贸易谈判“回合”，逐步实现贸易自由化。现在这个回合——多哈发展议程——是第九个回合。

自1947年关贸总协定缔结以来，成员国已大为扩充，从最初23个国家政府讨论工业品关税问题，发展到今天的150个成员国，谈判内容涉及农业贸易、工业品、非关税贸易壁垒、服务业、补贴以及知识产权等相关规则。

在成员国同意降低关税的同时，它们还承诺不使关税突破协议的“约束”水平，否则就要向出口受损国支付补偿，或面临该国的报复。迄今为止，发达国家百分之九十九的关税已被纳入约束税率，而发展中国家百分之七十三的关税已被纳入约束税率，从而形成了对提高关税这种保护手段的遏制。

世界大多数贸易国承诺遵循不断扩展的贸易规则，增强了国际商贸的清晰度和可预测性，并使全球出口额从1948年的580亿美元提高到2004年的8.9万亿美元。今天的世界贸易总量是1948年的23倍多。全球市场的开放促进了全世界生活水平的提高。

解决争端

然而，即使有明确的贸易规则，保护主义势力仍就某些行动是否违反协议规则提出争议，从而施加压力。因此，为解决贸易纠纷，必须有一个公正、及时、有效的机制。

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解决争端机制一直是关贸总协定体系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关贸总协定的争端解决机制允许争端一方无限期阻挠有关案件终审裁决的执行。其结果是争端长年无法解决，而随着各国对该机制无力解决贸易纠纷的失望加深，保护主义情绪随即产生。

有一个拖延得特别久的案例，涉及欧洲共同体（EC）对油籽加工提供补贴并鼓励使用本地油籽，从而违背了他们在1961年“狄龙回合”（Dillon Round）中对进口油籽的零关税承诺。美国对此提出的申诉持续了十多年。欧共体多次阻挠关贸总协定专家小组的组建。最后，美国国会于1988年通过了《贸易和竞争力综合法案》（The Omnibus Trade and Competitiveness Act）的附加条款，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此案到1989年仍得不到解决时，根据法案第301条款采取单方面行动，对欧共体的等量出口产品增收关税。最终，欧共体同意成立专家小组，专家小组裁决美国胜诉，从而避免了一场贸易战。

1995年1月，世界贸易组织诞生，成员国强化了争端解决机制，取消了阻挠成立专家小组的权利。根据新规则，如果经指令协商仍不能解决争端，世界贸易组织的专家小组将受理申诉案，而终审裁决必须在正式立案后的12至15个月内（含上诉时间）做出。成员国如果被判定违反世贸组织义务，必须纠正遵从，一般而言，须在终审裁决后的18个月内执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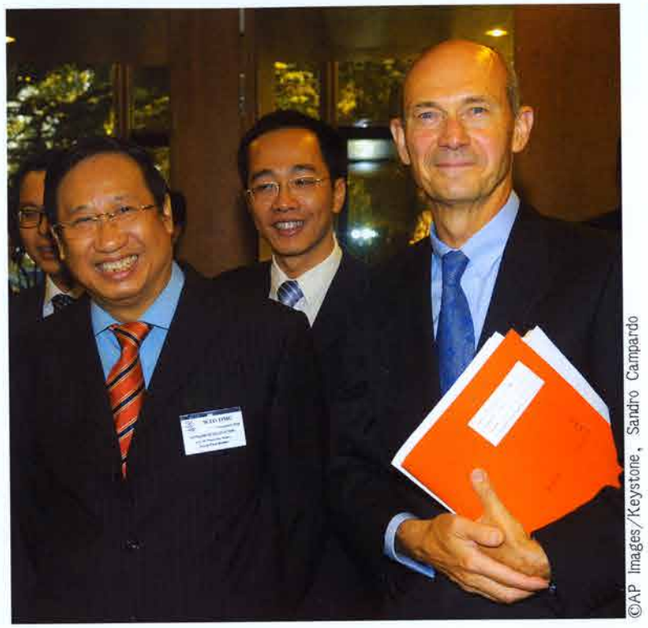
改良后的机制鼓励世贸组织成员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运用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纠纷。自1995年以来，已有至少55个国家提出申诉案，组成的争端解决小组已超过120个。因为申诉程序始于指令协商，所以数百个争端无需成立专家小组就得以解决。此外，世贸组织强有力的争端解决机制有助于各成员国平息国内认为其他成员国从事不公平贸易的不满情绪，并以世贸组织专家小组的结论为依据，使国内不符合规定的做法达到世贸组织的标准。

入世协定

世界贸易组织限制保护主义的另一个渠道是入世协定。非成员国一旦申请加入世贸组织，该国贸易体制就会受到严格审查，之后，申请国与所有成员国就存在利益的领域展开双边谈判。这个过程可能旷日持久。比如，中国在2001年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之前，花了15年时间进行入世条款的双边谈判。而最新加入世贸组织的越南则完成了为期11年的双边谈判。

在双边谈判完成后，要起草协议，阐明申请国在加入世贸组织后应履行的承诺。以中国为例，它同意逐步取消对工业品施加的所有数量限制；取消对外国投资者的产品的出口要求；强化知识产权执法；向外国提供商开放电信与金融服务等一系列服务业领域。越南同意降低关税、配额与农业补贴，以及对外开放某些服务业。

最后，世贸组织所有成员国必须一致批准申请国开放市场的一揽子承诺文件，一般有数百页之多，构成该国的入世协定。新成员国若不履行承诺，世贸组织便可据此申诉立案。2006年，美国与其他六个成员国针对中国提出申诉案，指控中国对进口汽车零件征收的费用违反了其入世协定。



©AP Images/Keystone, Sandro Campardo

世贸组织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会见越南外长范家谦（Pham Gia Khiem），越南于2007年加入致力于开放市场的世界贸易组织。

多哈回合谈判

通过进行谈判、制定规则、解决争端以及入世程序，世贸组织击退了保护主义。这个体系并非完美无缺，在亟需达成协议的关键领域尚未达成协议。比如，在农业贸易领域，尚未达成相关国际协议，禁止出口补贴与关税配额——后者指对超过配额数量的进口产品实施惩罚性高关税。

多边贸易谈判每一个新回合的目标皆是：扩大成员国开放市场的承诺，改善贸易体制的运作。据专家估算，上一个回合——乌拉圭回合——已创造数千亿美元的新经济机会。

于2001年启动的多哈回合谈判，如若成功，可同样大有斩获，因为多哈回合致力于减少乃至消除农业补贴，降低商品关税，扩大服务市场的开放，并提高世贸组织（包括解决争端机制）的透明度。专家预计，多哈回合若达成协议，可使数百万人脱离贫困，每年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数千亿美元，并纠正我们贸易体系中某些极端不平等的现象。达成多哈回合协议是我们应当共同为之奋斗的目标。

本文表达的意见不一定反映美国政府的观点或政策。

参考文献

关于贸易以及保护主义的补充阅读材料

Bhagwati, Jagdish. "Protectionism." (保护主义) In David R. Henderson, ed. The Concise Encyclopedia of Economics (经济学简明百科). Indianapolis, IN: Liberty Fund, Inc., 2002.
http://www.econlib.org/library/Enc/ Protectionism.html

Brown, Gordon. "How to Embrace Change." (如何欢迎变化) Newsweek (新闻周刊), vol. 147, no. 24 (12 June 2006): p. 64.
http://www.msnbc.msn.com/id/ 13121948/site/newsweek/

Campbell, Doug. "Protectionism's Dangerous Allure." (保护主义的危险诱惑) Region Focus (区域聚焦) (Winter 2006): p. 64.
http://www.richmondfed.org/publications/economic_research/region_focus/winter_2006/pdf/opinion.pdf

Das, Susanta S. "Evolution and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e Protectionism: Antidumping and Safeguard Measures." (贸易保护主义的演化与政治经济学：反倾销与保障措施) IIMB Management Review (IIMB管理评论), vol. 17, no. 4 (December 2005): pp. 51–65.

Dollar, David, and Aart Kraay. "Trade, Growth, and Poverty." (贸易、增长与贫困) Finance & Development (金融与发展), vol. 38, no. 3 (September 2001): pp. 16–19.
http://www.imf.org/external/ pubs/ft/fandd/2001/09/dollar.htm

Gaskin, William E., and Robert McKenna. "Protectionism's Flaws." (保护主义的缺陷) Washington Times (华盛顿时报) (11 December 2006): p. A21.
http://www.washtimes.com/op-ed/20061210-102200-9544r.htm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 Perspectives on Trade and Poverty Reduction (贸易与减贫之透视). Washington, D.C.: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 2006.
http://www.gmfus.org/doc/GMF_TradeSurvey%202006.pdf

Hudgins, Edward L., ed. Freedom to Trade: Refuting the New Protectionism (贸易自由：驳斥新保护主义).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Trade Policy Studies, CATO Institute, 1997.
http://www.freetrade.org/pubs/freetotrade/freetrade.html

Irwin, Douglas A. "Historical Aspects of U.S. Trade Policy." (美国贸易政策的历史观点) NBER Reporter (NBER报告) (Summer 2006): pp. 16–19.
https://www.nber.org/reporter/summer06/irwin.html

Panagariya, Arvind. "Free-Trade Skeptics: Wrong Again." (自由贸易的怀疑者：一错再错) Economic Times (经济时报) (25 January 2006).
http://www.columbia.edu/~ap2231/ET/et86_January25-06.htm

Patterson, Seymour. The Development of Free Trade in the 1990s and the New Rhetoric of Protectionism. (1990年代自由贸易的发展以及保护主义的新语言) Lewiston, NY: Edwin Mellen Press, 2006.

Paulson, Henry M. Remarks Prepared for Delivery by Treasury Secretary Henry M. Paulson Before the Con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y Annual Conference. (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在英国工业联合会年会上的发言稿)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28 November 2006).
http://www.treas.gov/press/releases/hp178.htm

Rivoli, Pietra. The Travels of a T-Shirt in the Global Economy: An Economist Examines the Markets, Power, and Politics of World Trade. (体恤衫的全球经济旅行：一位经济学家分析世界贸易的市场、权力与政治) Hoboken, NJ: John Wiley & Sons, 2005.

Roberts, Russell D. The Choice: A Fable of Free Trade and Protectionism. (选择：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的寓言) 3rd ed.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2006.

Rothbard, Murray N. Protectionism and the Destruction of Prosperity. (保护主义与破坏繁荣) Auburn, AL: Mises Institute, 1986.
http://www.mises.org/rothbard/protectio nism.pdf

Schott, Jeffrey J. "Costs of Failure of Global Trade Negotiations Have Been Understated." (全球贸易谈判的失败成本被低估了) Financial Times (金融时报) (23 June 2006): p. 12.
http://www.iie.com/pu blications/opeds/oped.cfm?ResearchID=644

Stokes, Bruce. "Dubai Deceptions." (迪拜的假相) National Journal (国家期刊), vol. 38, no. 11 (18 March 2006): p. 52.

Suranovic, Steven M.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and Policy Analysis. (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分析) 2003.
http://internationalecon.com/v1.0/index.html

Tupy, Marian L.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Sub-Saharan Africa."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贸易自由化与减少贫困) Policy Analysis (政策分析), no. 557 (6 December 2005): pp.1-23.
http://www.cato.org/pub_display.php ?pub_id=5236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Office of the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The Benefits of Trade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贸易对发展中国家的好处) Trade Facts (贸易事实), June 2006.
http://www.ustr.gov/assets/Document_Library/Fact_Sheets/2006/asset_upload_file346_9610.pdf

Vant, Thomas R. "Resist Protectionism." (抵制保护主义) OECD Observer (OECD观察), no. 255 (May 2006): pp. 37-38.
http://oecdobserver.org/news/printpage.php/aid/1861/Resist_protectionism.html

Williams, Walter E. "Trade Charade." (贸易游戏) Washington Times (华盛顿时报) (26 October 2006).
http://www.washingtontimes.com/commentary/20061025-092622-8524r.htm

美国国务院对以上资料的内容及其链接可靠性不承担责任。

相关网站

有关贸易与保护主义的网上资料

U.S. GOVERNMENT（美国政府）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纽约联邦储备银行）
http://www.newyorkfed.org/education/f x/free.html

Office of the U.S. Trade Representative（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http://www.ustr.gov/index.html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美国农业部）
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 WTO Briefing Room
http://www.ers.usda.gov/briefing/Wto/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美国商务部）
U.S. International Trade Administration
http://trade.gov/index.asp

U.S. Department of State（美国国务院）
Bureau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Affairs, Trade Policy and Programs
http://www.state.gov/e/eb/tpp/

Bureau of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Programs, Trade and Economics（国际信息局，贸易与经济专栏）
http://usinfo.state.gov/ei/

OTHER RESOURCES（其他资料来源）

CATO Institute, Center for Trade Policy Studies（加图研究所贸易政策研究中心）
http://www.freetrade.org/index.php
加图研究所贸易政策研究中心的使命是增进公众对贸易的好处以及保护主义的代价的了解。

Economic Strategy Institute (ESI)（经济战略研究所）
http://www.econstrat.org/
经济战略研究所致力于保障全球化与市场的力量相结合而取得最大好处、反对扭曲市场以及增加成本。

Globalisation Institute（全球化研究所）
http://www.globalisationinstitute.org/index .php
全球化研究所是2005年成立的智库，旨在探讨如何使全球化服务于世界贫困人口。

The Library of Economics and Liberty（经济学与自由图书馆）
http://www.econlib.org/index.html
经济学与自由图书馆致力于促进经济学、市场与自由的研究，为学生、教师、研究人员以及经济思想的爱好者提供研究资料。

National Foreign Trade Council (NFTC)（国家外贸委员会）
http://www.nftc.org/
国家外贸委员会是美国的商业组织，旨在促进本会成员的国际与公共政策优先议程，包括国际贸易、投资、税务以及出口融资等。

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http://www.oecd.org/topic/0,2686,en_2649_37431_1_1_1_1_37431,00.html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http://www.iie.com/r esearch/researcharea.cfm?ResearchTopicID=5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前身是国际经济研究所，以研究国际经济政策问题为己任。自1981年以来，

该所针对重要的国际经济问题提出及时客观的分析以及具体的解决方案。

United States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USCIB)（美国国际工商理事会）
http://www.uscib.org/index.asp
美国国际工商理事会创立于1945年，旨在促进自由贸易，并在新成立的联合国代表工商界。该会将工商界的观点直接反映给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联合国的官员以及欧盟等国政府与组织。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世界贸易组织）
http://www.wto.org/

美国国务院对以上资料的内容及其链接可靠性不承担责任。

新交流英文版有关信息

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IIP）出版四种电子期刊，探讨美国和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这四种期刊分别是：《经济视角》、《全球事务》、《外交政策》以及《美国社会与价值观念》。这些刊物不仅发布美国政策声明，而且介绍美国社会及其制度、价值观和思想。电子期刊的新、旧期目以及待出期目可在以下网站上查找。读者亦可在网上阅读、转发、下载和打印文章。

http://usinfo.state.gov/mgck/home/products/ejournals.html

欢迎提出宝贵意见，请与当地美国大使馆或本刊编辑部联系。

美国大使馆新闻文化处
新交流编辑部
xinjiaoliu@yahoo.com
传真：（010）653229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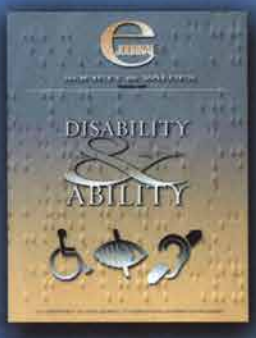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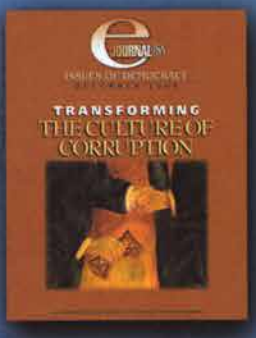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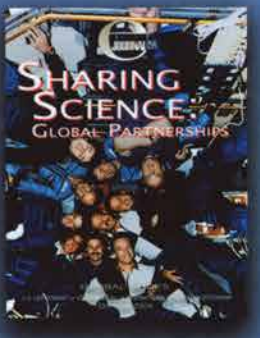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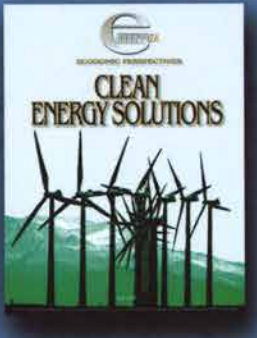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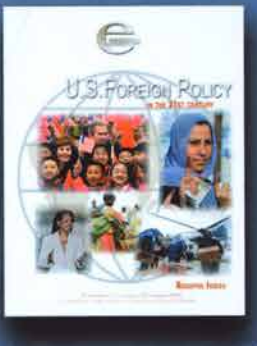
编辑 Jonathan Schaffer
常务编辑 Bruce Odessey
文字编辑 Kathleen Hug
图片编辑 Ann Monroe Jacobs
封面设计 Diane Woolverton
参考资料专家 Linda Johnson
特约编辑 Jaroslaw Anders
Paul Malamud
Andrzej Zwaniecki

总编 George Clack
执行总编 Richard W. Huckaby
制作经理 Christian Larson
制作经理助理 Sylvia Scott
网络制作 Janine Perry

编辑委员会 Jeremy F. Curtin
Janet E. Garvey
Charles N. Silver
Jeffrey E. Berkowitz

新文流

请告诉我们您所感兴趣的领域。

请在相应的标志上画X。

- ●经济问题
- ●美国对外政策
- ●环境、能源和全球问题
- ●政治问题
- ●文化和社会